

漢唐
陽定

金以林·著

蒋介石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党内元老和地方实力派的普遍不满和不服，从1931年2月28日到1932年3月1日，这是蒋介石确立“最高领袖”地位过程中最危机重重的一年零一天……

国民党高层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国民党高层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的派系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金以林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97-1151-4

I. 国… II. 金… III. 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
IV.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2934 号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著 者/ 金以林

出 版 人/ 谢寿光

总 编 辑/ 邹东涛

出 版 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网 址/ <http://www.ssap.con.cn/>

网站支持/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zongbianshi@ssap.cn

项目负责人/ 徐思彦

责任编辑/ 徐思彦

责任校对/ 宋荣欣 桂芳 陶璇

责任印制/ 董然 蔡静 米扬

总 经 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各地书店

销售热线/ (010) 62142489 62164516

排 版/ 润之源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7-1151-4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国民党“一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在经过“廖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迅速崛起。到1928年二次北伐时，国民党中枢暂时出现了蒋介石一人在朝，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分别下野出洋的局面。

一 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13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逐出广州	18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23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32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43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蒋介石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而胡也需要倚仗蒋的军事实力，来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这是蒋胡合作的基础。但胡一贯以党国元老自居，蒋则依靠“军权”逐步侵蚀胡的“党权”。这一矛盾随着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走向相对稳定而愈演愈烈。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53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63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73

第三章 约法之争和胡汉民被扣

国民党自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党内各派反蒋势力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最终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共同目标下结成同盟，军事上演变成中原大战，党政方面召开了“扩大会议”，但都相继失败。胜利一方的蒋介石顺势接过反对派倡导的“民权”、颁布约法，掉过头来对付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蒋胡相争，终于激起了汤山事件。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85
二 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87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91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94
五 汤山事件.....	102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胡汉民被囚后，国民会议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发展，新公布的《约法》，为蒋氏独裁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蒋的权力似乎牢不可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因囚禁胡汉民而触发的党内不满情绪，使蒋介石意想不到地面临着另一场更大的挑战……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113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121
三 国民党内对《约法》的反应.....	127

第五章 “非常会议”和广州开府

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真正赢得人心；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胡汉民被囚后，经过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又联合起来公开反蒋。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133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142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145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150
五 广州开府·····	160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170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宁粤对峙公开化后，北方反蒋势力也跃跃欲试。这些地方实力派尽管对蒋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这些弱点，自然便于蒋分化收买，各个击破。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189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209
三 甘肃雷马事变·····	221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231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各方势力被迫和解。10月22日，蒋、汪、胡三人于上海会谈。这是自1926年“廖案”之后三人唯一一次会面，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接下来宁粤双方代表举行和谈，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239
二 国难当头，被迫和解·····	249
三 宁粤广州会议·····	253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269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召开，选举产生了拥护蒋、胡、汪三人的中央委员，并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这在国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显而易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是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285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289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302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310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以退为进，同意下野，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的地位。为了将来的卷土重来，蒋在向中常会辞职前两小时，先召开国务会议，任命了一批省府主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在北方，很多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和阎锡山的晋系将领，心理更是倒张（学良）重于反蒋。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319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335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353

第十章 蒋汪合作

汪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令胡深恶痛绝，这次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又一次自食其言，主动同蒋合作，胡已无能为力。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373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384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392
四 蒋汪合流，重掌中枢·····	400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宁粤对峙期间，反蒋派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甚至相互对立，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面对浙江籍的蒋介石企图霸占“党国领袖”地位，他们的共同反应就是不满和不服。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418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421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429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437

结语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零一天，蒋、汪、胡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汲取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胡所代表的“党权”，自己则牢牢抓住“军权”不放，逐步巩固统治，并最终确定了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征引参考资料索引·····	449
后 记·····	463

绪 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 22 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权 17 年的北洋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 1928 年底东北易帜起，国民党宣称实现全国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内部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冲突，成为民国政治史中惹人注目的突出现象。

对这种现象，以往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蒋介石长期以来始终视军队如生命，离开对军事的控制，便没有他 22 年的统治可言。但仅仅如此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为什么说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原因在于：这个政权的统治始终是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旗下进行的。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虽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他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上至中央政府最高机构，下至全国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国民

党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被称为“训政”时期。由谁来主导“训政”？标榜的也是由国民党负责实施，以实现“总理遗教”。即便各派政治势力角斗时，如果得不到党内高层派系的支持，也只会被看作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形成大的局面。

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凭借他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还能笼罩和控制全局。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季陆回忆道：他原来不赞成在大会宣言中写明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要求（如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但“当听到总理把本案提出表决时所说‘赞成者请举手’时，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种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动的、轻轻的、高高的举起来，衷心的表示赞同，表示折服。”〔1〕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实行。”“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2〕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的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即在党内留下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真空，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围绕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廖仲恺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杀。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

〔1〕 黄季陆：《黄季陆先生怀文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35、36页。

〔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92、94页。

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是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中虽也有一些国民党元老，而且人数不少，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足以同胡、汪相比。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而且长期没有处在高层地位。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由于掌握了这支“党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才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不满39岁，在国民党内还没有成为足以服众的“最高领袖”。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不能忽视这种演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但仅靠“军权”而无“党权”，是很难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正如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1〕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尽管蒋介石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始终抓住军权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视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党统”观念。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2〕对中国国民党来说，它的高层派系矛盾的起

〔1〕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年第3版，第531页。

〔2〕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自选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72页。

伏，几乎都反映了这种“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这样一个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蒋为中心，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1〕}

按照陈独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战争之始，尽管党内的派系矛盾已日益上升，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团结的局面。但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后，党内矛盾充分公开，并导致宁汉分裂的局面；而当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的四个集团军还能一致行动，但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从编遣会议开始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

中原大战胜利后，历来只看重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以为国内再也没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断专

〔1〕 相关论述参见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行，同标榜“党权”高高在上的胡汉民间矛盾不断加深（谭延闿刚好在中原大战胜利之际去世），蒋介石就掉过头来收拾胡汉民，没想到再次引发国民党内影响更大的大分裂，出现了宁粤对峙，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后一年多的宁粤对峙期间，局势的发展更加复杂和微妙，并曾连续出现蒋胡、汪胡、蒋汪三次合作，以对抗另一方，均以二对一者取胜。在此期间，党内斗争虽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独裁”、“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派系纠葛。恰在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正如陈独秀所言，已获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面对外辱，不得不暂时结束派系争纷，走向表面的“团结”。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抚平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有关这一论点影响最大、最传统的论著当属陈伯达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二书，^{〔1〕}他将国民党统治集团简单地划分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西方学术界有关国民党派系政治方面的论述，也是相当丰富的。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设有专节讨论“国民党诸派系”。^{〔2〕}

相对而言，在国民党内或许认为“派系”一词在意识形态方面含有贬义色彩，因此，长期以来党国诸领袖大都对此保持缄默。这和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军阀公开承认自己所隶属的派系态度

〔1〕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香港，长江出版社，1947；《人民公敌蒋介石》，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地点不详，1948。

〔2〕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完全不同。但是，如同北洋军阀可以明确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一样，国民党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愿指责他人有派系联系。”〔1〕

这种派系冲突，自民国以来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研究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活动中，就明确指出政治冲突的重要结构是派系活动。〔2〕陈志让（Ch'en Jerome）的研究同样表明北洋时期存在着广泛的令人难以分清的派系联盟。〔3〕易劳逸（Lloyd E. Eastman）则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政治冲突。〔4〕田宏茂（Tien Hung-mao）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5〕

以上诸多论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会所说的“党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黎安友给“派系”一词定义道：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

〔1〕 Ch'i His-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1—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196—198.

〔2〕 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32.

〔3〕 Ch'en Jerome, “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1, 1968, pp. 563—600; Ch'i His-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0—17.

〔4〕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5〕 田宏茂：《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原刊 Chan F. Gilbert, ed.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1927—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中译本见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6—81页。

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1〕}

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着二层含义，即“派”和“系”。尽管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最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我们可以再划分出“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但在近代中国派系冲突的现实中，这两个词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分别称之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于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张、唐看作改组派；同样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仑、钟天心等年轻一辈的“再造派”，而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视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间从不混淆。在当事人看来，也分得一清二楚。

从以上众多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中，我们不难将其分为两类。特别是在讨论国民党内的政治冲突中，必须严格区别对待这两类派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

〔1〕 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p. 32.

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投奔或效忠于国民党，大都始于北伐前后。虽然他们拥有相当的实力，并时常对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他们在党内的资历很浅，一旦想挑战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党外拉帮结伙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拥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反对派，反抗中央。在二次北伐统一全国后爆发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实力派根本无法代表所谓的“党统”，自然更是谈不上“护党”，因此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就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第二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国民党内，而经常会超越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国民党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目的，还是在努力寻求党员的支持，追求国民党的正统性，以达到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为目的。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第二类派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如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而形成的敌对派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派系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类派系纠葛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掺杂着个人权力和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抗战以前。当然权力之争与主义之争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在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纠葛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这里面既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加剧派系冲突的一面，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国民党由广东一隅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另一种政治派系则

以蒋为核心而分立竞争，^{〔1〕}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后期。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有意将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统治。这是中国传统的驭人之术。上述分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第一种主要是指国民党组织结构内存在的众多的“派”（faction），它们都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而彼此之间又是一种既对等又对抗的关系；第二种则是专指在蒋“派”下，出现的众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于蒋氏个人。其实，并非只有蒋“派”之下才有“系”，几乎每“派”之下，又分别控制着一些“系”。他们彼此之间在党内冲突中不断分化组合，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2〕}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缓和。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之争，马上浮出水面。首先在是否坚持“容共”问题上，导致党内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实行倾向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而被视为党内“左派”；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等人分裂成西山会议派，形成了党内的“右派”。此时的胡汉民则因忠于孙中山的遗教，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3〕}

〔1〕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 - 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5-47.

〔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第92页。

〔3〕 有关国民党左派的论著见 Ch'en Jerome, "The Left Wing Kuomin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5, 1962, pp. 557-574;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 - 1931*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谢幼田的《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则详细记述了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史实。